

第四章、資料分析：電視新聞素材需求如何形成？

攝影記者 B 與 C 處理的二則新聞事件，跟他們目前主跑的新聞路線性質完全不同，但是二位攝影記者卻仍然能夠取得足以用於新聞製作的特定影音素材，素材裝載的意義也能夠與文字記者的文稿相呼應；二者很顯然地具備了某些“能力”，讓他們得以從容進行新聞製作的專業活動，以下透過訪談資料的分析，研究者試圖自以下五點描繪電視攝影記者進行專業活動時的「實務智能」面貌。

第一節、經驗加上現時的資訊，形塑對於事件情境的想像

電視攝影記者極少負責特定採訪路線的人際網路、事件資訊的搜集整理、和產製過程中的訊息回報、報導角度以及新聞文稿撰寫等工作；理由無他，電視新聞組織的分工就是如此，因此在事件現場，往往會看到文字記者還圍著事件當事人或是受訪者追問問題，但是攝影記者可能已經將攝影機放在地上，跟其他同業開始聊天，這不是攝影記者在偷懶，而是已經評估先前拍攝的畫面與聲音素材，足以完成特定電視新聞題材的製作。

攝影記者的狀況也是如此；案例一中的攝影記者 C，為達成特定素材蒐集的工作目的，必須先知悉採訪任務的內容；C 上班的時間是週六，依照 C 以往的工作經驗，若是搭檔的文字記者沒上班，便會與其他上班的文字記者搭檔，因此採訪的新聞事件可能會與原本負責的新聞路線不同，因此 C 對於當天個人可能被派遣的型態(單機出勤)已經有心理準備；在當天接受任務時，C 既已認知到此一工作狀態的產生，因此 C 先找採訪主任探詢採訪事件人、事、物資訊，避免到達現場時，因為相關事件資訊不足，新聞取材發生漏失，影響接下來的內容製作。

攝影記者 B 的當天的採訪活動情境雖與 C 不同，但在過去的工作經驗中，知道夜班記者處理新聞內容的不確定性，高於平常負責固定路線的同仁，因此自文字記者口中得知採訪任務時，反而不會立即詢問事件的內容，因為文字記者所獲得的資訊來自夜班主管，其資訊的內容亦不明確，只知道是木柵動物園的公關活動，目的是要宣導動物園的夜間開放時段；因此依照個人以往的工作經驗，判斷此新聞事件係宣傳活動，其資訊可以到現場再找人詢問，何況有文字記者隨行，有人專責資訊蒐集與取捨，可以從容決定拍攝取材的內容。

二個案例所呈現的，都是攝影記者在採訪活動開始之初，試圖透過週遭環境不同型式的工具，以獲得事件時空的資訊，並與個體先前工作經驗、記憶進行整合與比對，形成到達事件現場前對於新聞事件的想像。因此傳統資訊理論中描述人類傳播過程中資訊活動的“固定、不變、穩定”特質，忽略了資訊搜尋與問題產生之間的認知過程，往往無法解釋人類解決問題活動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說要解釋攝影記者的素材蒐集活動，必須以所處的特定時空來觀察，才能詮釋個體搜尋資訊的意義。

第二節、取得、判讀情境資訊，藉以蒐集可用素材

攝影記者藉由情境週遭的不同來源和工具取得資訊，並藉以建構對於新聞事件情境的想像後，接下來的工作就是設法取得製作電視新聞的素材。

攝影記者腦中帶著「事件情境的想像」進入新聞事件的時空，還是要藉由視覺與聽覺的功能認知週遭環境的變化，並不斷觀察、蒐集事件時空的資訊，以判斷是否使用電子攝影機進行拍攝，擷取可用的素材內容。就攝影記者 C 的先前知識，即自身認知的工作經驗、電視新聞的產製流程、資源與限制，配合人際網路與工具

提供的資訊，建構了事件的「擬態」，即使進入新聞事件現場，他還是要跟事件現場的人、事、地、物發生互動，以獲取更新的資訊內容。C 在衛生署防檢局的大廳拍攝發言人的畫面與聲音，也將防檢局的大廳現場拍攝作為素材，過程中與先前「事件情境的想像」的資訊內容，比對與判讀當下時空所獲得的資訊，認為在防檢局拍攝官方回應所取得的素材，只是整個新聞製作所需素材的一部份，同時 C 也從發言人的官方回應，了解疫苗注射事件的官方態度與處理做法，他即按照先前的工作經驗，以行動電話回報採訪主任有關防檢局回應的摘要內容，供其決定這則新聞的處理方式。

同樣的自動化歷程(Automatic Process)也出現在攝影記者 B 身上，因為每一位攝影記者的專業活動執行過程，組成的資源與提取資訊的工具均源自個體的先前知識與事件當下情境，及令進入事件時空，進行蒐集資訊、拍攝紀錄可用的素材，過程都是獨一無二的。B 與文字記者搭配，到達事件現場後，事件資訊的蒐集有人幫忙，就可以專心將眼前所見，依照先前所獲得與事件相關的資訊進行比對，來判斷是否值得拍攝作為素材；且因採訪時所攜帶的錄影帶與攝影機電池有數量上的限制，也影響 B 在事件現場所進行的素材蒐集活動，所能取得的素材數量。

攝影記者在素材蒐集中，觀察事件現場的資訊活動，會試圖找出與先前夜班主管提供的現場人、事、地、物等等資訊，建立當下時空位置的認知，此時同行的文字記者也為了撰寫文稿，必須於事件現場獲取可用的資訊，更為了獲取可用的影音素材，也會主動提供可用的資訊給攝影記者作為取材參考。

如上所述，攝影記者在特定的事件時空，經歷和蒐集了自身的臨場資訊，也包括文字記者所提供的其他來源資訊，他會開始思考這些資訊來源所代表的人事地

物，如何藉由攝影機的拍攝進行素材的蒐集，以及蒐集的素材是否符合新聞製作的需求。

攝影記者認為先前主跑台北市政府路線的經驗，讓他對於事件現場的地理位置、園內的設施，甚至相關資訊來源的「窗口」都可以掌握，這也讓他進入事件現場時，能立即與自身經驗資訊進行比對，找出事件進行的地理位置（動物園的主舞台、不同動物區的位置），和重要人物(市長)；而當動物園的義工身著特定制服出現，以及動物園公關科長走近記者試圖提供協助、資訊時，有助攝影與文字記者辨識新聞事件的“核心價值”，決定素材的蒐集內容。

攝影記者在進入特定新聞事件的時空之前，透過不同來源的資訊，建構了事件場域及新聞呈現架構的想像；進入事件的情境時，攝影記者也透過觀察事件情境的變化，獲取“當下”的資訊，並且不斷修正對於事件的認知，作出蒐集素材內容的決定。

第三節、蒐集資訊「破口」，建構特定素材的需求

前文提及資訊尋求行爲的概念，在於個體的資訊尋求過程，必須要建構在「現時/現地」(Now & Here)的情境背景，並且在不斷變動的時空中，經歷「當下」(Right on Time)活動的歷程，才會有意義；因此在某個位置，人會定位在時間與空間的某一點蒐集資訊，其活動過程也逐漸成爲個體的經驗，形成另一種資訊架構，作爲素材蒐集活動的依據；攝影記者進入事件現場後所進行的活動，其活動表象就是攝影記者肩扛攝影機、在動物園裡行走，或是停下腳步，對著動物園的設施進行拍攝。但是假如從攝影機的觀景窗，觀察攝影記者的素材蒐集活動，檢視攝影記者拍攝影

帶的內容，他們的雙眼、雙手操弄攝影機、擷取素材，而身體器官也接受大腦的指令作出拍攝的專業活動，再與出發前的事件資訊與個人的工作經驗進行比對，可找出事件時空的變化，就人、事、時、物影響新聞事件的發展程度，即可判斷素材拍攝的重要性。

第一則案例中，研究者發現攝影記者 C 到達衛生署防檢局時，依據先前採訪主任提供的資訊，以及個體的工作經驗，判斷新聞部會另外派遣一組記者到當事人家中採訪受害少年家屬，拍攝該則新聞製作所需的素材，攝影記者認為只要將防檢局的官方說法素材帶回來，交給上述至受害少年家屬採訪的記者即可，不必負責新聞的剪輯製作。

然而，回到辦公室之後，得知採訪主任對於該則新聞的製作方式，與 C 先前的判斷大相逕庭，他爲了要完成新聞剪輯的工作，必須另闢蹊徑，設法取得可用的素材，且該主任也提供該則新聞畫面的素材需求，於是 C 想起先前採訪中心主任提供的報紙(工具)中登載的資訊內容，即當天報紙版面上一張受害少年的左手特寫照片，C 認為這張照片背後所凸顯的訊息已經能夠代表這則新聞事件的重點，隨即將該張照片拍攝作為新聞所需的素材。

但是電視新聞的敘事結構，是由一連串動態的影音符號，藉由剪輯產生意義所形成，光是使用攝影機翻攝報紙上的一張照片，素材的數量是不夠的，所以採訪主任會先要他設法找到“注射”的資料畫面，當下他也有同感，除了原先取得的報紙照片素材之外，也找一些幼兒、孩童在醫院接受注射的資料畫面；最後，電視新聞的產製、播出流程，以及新聞稿件的播出順序等等工作規範，也讓攝影記者必須至資訊部的資料片庫尋求可用的過時資料影帶作為素材。

攝影記者一連串素材需求的產生，是基於回到電視台之後，得知主管做法後的決定；而他也運用自身的工作經驗，包括了自身過去的採訪經歷、生活體驗、組織的新聞產製流程、資料片庫的借用規定，以及進入新聞產製的情境之後，不同型態的工具、物件，包含與同仁主管的對話、電腦硬體、檢索系統的使用等等，則又再度讓 C 已存在的經驗資訊與情境週遭的資訊進行對話與整合，引發特定素材蒐集的活動。

第二則案例中，素材取得活動的資訊，取得於進入新聞事件的情境之後。攝影記者 B 除憑藉工作經驗，對動物園的內部陳設有所理解之外，對於動物園夜間開放措施的細節並不了解；在進入事件情境之後，只能依照現場觀察到的“當下”場景，搜尋動物園夜間開放可能進行活動的地點，而當他發現台北市長正在動物園入口的舞台致詞，依據工作經驗，市長致詞的內容應該與動物園夜間開放有關，B 立即架起攝影機拍下市長致詞的實況，取得可能會用到的素材。

此外 B 與文字記者接近市長致詞的舞台還有另一個目的，就是為了找尋新聞事件“資訊濃度”較高的情境，其做法在於市長致詞的場域，與事件相關的人員、事物都應該聚集在此，因此二人一到達動物園，會立即找尋相關活動的情境發生時空，那麼接近相關的人、事、物，和取得事件相關資訊的可能性也愈高。

B 與文字記者後來果然碰到了動物園的公關科長，公關科長這個“工具”是 B 先前採訪工作活動所建立的人際網路；透過科長的口中得知夜間開放活動的地點在動物園的夜行動物區，即與文字記者同行，前往目的地進行採訪與取材的活動。B 在此案例中接觸的資訊來源其實很少，文字記者所能提供的事件資訊極為貧乏，因此只知道要前往動物園採訪市政府的活動，B 很難想像接下來進入動物園之後的素材

採集活動重心為何；到了動物園門口，二人看到不遠的舞台上，市長正在致詞，工作經驗促使他向舞台走去，試圖接近特定事件的時空，進行更進一步的資訊蒐集活動；因為 B 接近舞台，除了拍攝市長的致詞，從中獲取與事件相關的資訊之外，也與動物園的相關人員接觸，獲得更進一步的事件資訊，建構素材搜尋活動。

Pea(1993)指出人類心智在活動過程裡，都會結合日常生活實務運用上的經驗「智能」(Intelligence)。也就是說不同形式的智能資訊分散於個體所處的情境當下，附掛在人類創造、設計的工具中，並與工具本身的物性結合；攝影記者 C、B 的案例中可以明顯看出，攝影記者在決定畫面素材的擷取與蒐尋活動開始之前，一定會有資訊搜尋的活動，不同型態的資訊也因為攝影記者的需求而浮現，像是 C 接獲採訪任務的資訊來源是採訪主任，到達現場後拍攝錄製防檢局發言人談話的素材蒐集活動過程則是根據過去的工作經驗決定，素材是否足以完成新聞製作的判斷又來自採訪主任的新聞架構指示。組織新聞產製流程、資料影帶使用管理流程、和檢索軟體使用方式等等資訊，形成攝影記者進一步的特定素材搜尋活動；如同 Pea(1993)所言，人類生活的環境充滿了不同用途所發明的工具，並持續使用各式各樣的工具來建構活動，或用來儲存經驗、避免錯誤。

攝影記者 B 亦是如此，即使出發採訪時所獲得的新聞事件資訊不足，到達事件現場後仍可依賴自身的工作經驗，發現台北市長致詞的地點，到達該地點立即找尋可用的資訊來源，接下來則是自先前的人際網路(公關科長)獲知有關於動物園夜間開放的相關資訊，得以與自身先前工作經驗再度結合，很快速地找到目的地，拍攝製作新聞所需要的素材內容，因此研究者認為攝影記者 B 即使從接獲採訪任務通知、到達事件現場時都沒有足夠的事件資訊讓他作出取材的判斷，但 B 仍可以

運用自身過去的採訪經驗，作為進入特定時空事件、判斷其中的人、事、地、物是否具有取材價值；。

第四節、認知新聞敘事「斷層」、發展素材蒐集活動

Pea(1993)認為人類行動的解釋與發生都來自智能的運用與發展；塑造、激發人類行動的智能，不僅配置於人類個體，同時分散於個體所處時空中的不同情境，以不同的型式存在，攝影記者 C、B 的案例中，也可以看出來他們是如何理解、判讀週遭情境的資訊「破口」，辨識特定素材的需求與取得，藉以修補新聞敘事呈現的「斷層」。

攝影記者 C 接到採訪任務時，其所認知的素材需求僅僅止於衛生署防檢局發言人的說明，也就是說基於自身的工作經驗，包含平日單機採訪新聞事件後的處理方式、接受周六、日的特定型態任務派遣，以及特定新聞的處理等等專業活動經驗，認定這則新聞有另一組記者(文字+攝影)前往受害少年家中訪問；因為攝影記者若是被單獨派遣前往特定地點採訪特定人物，通常都是只取得新聞事件中另一方的說法，而此狀況中的“另一方”指的往往是官方、政府、或是設有公關部門的企業體，這類機構的意見呈現方式，通常以新聞稿、發言人談話的方式表現，其內容也以特定事件為主，也不需要文字記者提出問題(或者也不希望有記者提問)，只要派遣攝影記者前往拍攝負責人、發言人或是取得新聞稿即可。攝影記者前往防檢局時，就是意識到先前的專業活動經驗，認為防檢局發言人的回應，只是該則新聞所需要的素材之一，也是 C 第一次意識到該則新聞素材所呈現的斷層存在。

回到新聞部，攝影記者收到採訪主任新的指示，當下意識到先前新聞事件素材

蒐集、剪輯編排的構想被推翻，而有關於受害少年與家屬的相關影音素材亦付之卻如，但是主任已經有了對於這則新聞架構的想法，和製作這則新聞所需素材的需求，C 在明白採訪主任的想法後，又想到出發採訪看到的當天報紙版面，有一張受害少年左手臂紅腫發炎的照片刊登，當下決定先用攝影機拍攝作為素材；採訪主任也提出特定素材內容的需求，對 C 來說等於是接收到了特定素材的需求資訊，因此 C 必須針對採訪主任的特定素材需求有所因應。

接下來攝影記者分別運用自身的生活、工作經驗，考量組織的新聞產製流程、截稿時間，使用資訊部門建構的資料影帶檢索軟體，以及運用先前採訪此則新聞獲得的相關資訊，選用特定關鍵字進行檢索，等於是運用了 C 自身的社群關係、組織的內容產製規則，以及攝影記者在組織內被賦予的任務分工型式。C 藉由此一活動系統網路，交換可用的資訊，並藉由資訊的獲得與整理，再次建構了特定素材的需求與蒐集活動，以符合該則新聞製作所需的特定素材需求，並藉以取得特定素材，趕上特定新聞播出時段的截稿時限。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動物園夜間開放新聞事件，研究者亦可發現攝影記者 B「解題活動意向」(Intentionality)出現，係源於對「特定資訊」需求的期望。B 透過個體與情境中不同工具、人際網路的互動，以滿足特定資訊的需求，建構蒐集特定素材的專業活動；B 雖然一開始未能獲得與新聞事件相關的資訊，但是隨著他進入動物園、觀察新聞事件現場的人、事、物、時空變化，找出可能取得進一步事件資訊的地點與提供資訊的特定人士，藉以協助找出動物園夜間開放事件的「核心價值」資訊，這也促使 B 前往夜行動物區，能夠儘速取得所需素材，填補該則新聞敘事的斷層。

回到新聞部，在製作新聞的過程中，因為主管修改文稿內容，致使 B 發現原本已經完成的新聞架構被修改，加入了貓空纜車的搭乘資訊，B 當下意識到該則新聞的缺口，必須設法取得特定素材填補，而距離截稿時間僅剩下 10 分鐘不到，他就依據組織分工，前往資訊部門下屬的新聞資料影帶片庫尋求奧援。

新聞影帶資料片庫依照特定的編目方式，儲存攝影記者的拍攝影帶與每日新聞播出帶，資訊部門也運用電腦與網際網路建構一套檢索系統，供記者查詢調閱影帶使用；攝影記者 B 在新聞部工作多年，對於資料影帶的搜尋與使用程序有豐富的使用經驗，也就是說即使不同單位，B 也能根據需求使用期望提供的資源，憑藉多年新聞部門的工作經驗，連結工作情境工具、資源取得所需的素材；B 的能力其實來自於他對工作情境中資訊的掌握與理解。

此外 B 與片庫影帶管理師的人際網絡關係，也幫助他跳過使用影帶檢索系統等待結果出現的時間，間接運用管理師的影帶管理實務智能，快速地取得所需要的過時資料影帶內容。

電視攝影記者產製新聞內容和蒐集素材的過程一如 Dervin(1991)的觀點，自接收新聞採訪任務後，開始檢視自身定位，也就是採訪工作的特定時空位置；接下來會以自身的經驗作為「參考點」，與週遭的情境進行接觸，找出與採訪任務相關連的資訊內容，逐漸彌補個體經驗與情境間的資訊落差，同時也藉由獲得的資訊，對新聞事件的取材情境展開認知活動，而當攝影記者經由情境資訊的接收與判讀，找出資訊落差所引發的事件時空變化，成為攝影記者拍攝取材的重心。回到組織內，文字記者文稿撰寫與核稿修改的結果，如果與攝影記者之間的經驗品質接近，或是事前能有足夠的時間溝通，那麼攝影記者採訪過程運用攝影機取材的畫面素材應足

以滿足特定新聞製作的需求；但是檢視二個案例，研究者發現二位攝影記者都進行二次發現、填補新聞缺口，並設法取得特定素材的專業活動，而這二次素材搜尋活動的觸發，都源於攝影記者在工作情境中所接收的資訊。

Taylor(1981)認為個體潛藏、模糊、未知的需求層次(Visceral Level)，必須經由特定資訊的取得，使得需求問題得以具體成形而條理化；同樣地，攝影記者也是如此，當認知新聞事件的情境，而使用攝影機進行取材時，攝影記者同時也在消化新聞事件情境中接收的資訊，用以區分、獲取新聞產製所需要的素材內容。

案例中攝影記者的素材蒐集活動，展現了與工作情境中不同因素互動、取得資訊的過程，同時資訊的蒐集、使用，也讓他能夠認知自身在情境中掌握的資源和限制，以決定素材的可能來源，進而產生特定素材的蒐集活動。

第五節、蒐集「填補斷層」素材的活動

從先前的二個案例，可以看見攝影記者對於組織外的事件情境、組織內部資源、常規與限制具備了充分的認知，資訊的接收與分析顯現時空變化的過程，促使蒐集特定素材的活動發生。攝影記者在蒐集素材過程中，也會不斷檢視整個素材獲取，是否有新的資訊進來，以及新資訊對於素材蒐集內容的影響。在疫苗注射引發藥害的案例中，攝影記者 C 發現有關於受害者與家屬的相關素材付之卻如，而採訪主任提出的素材需求，顯然點明了素材蒐集的方向，C 因此使用電腦與檢索系統，在數萬小時的過時新聞影帶中找到了所需的資料畫面。在這個階段，可以看到 C 的搜尋活動中，組織常規(新聞派遣、製作程序、新聞截稿時間、資料影帶借用規定)、工具智能(檢索程式、資料庫)、人際網絡(採訪主任)等等不同來源的資訊，

與個體的工作經驗結合，能引發特定素材的想像與搜尋活動。

在動物園夜間開放的案例中，攝影記者 B 雖然有文字記者搭配，但是對於該事件的相關資訊事前仍無法透過文字記者提供並掌握，因此直到事件現場時仍無法了解事件的內容；B 只能邊觀察現場、邊運用攝影機取材，並運用所觀察到事件時空環境的變化(市長致詞所在的舞台設計、擴音器廣播發出的聲音)，取得與新聞事件關聯性更為緊密的資訊，而 B 最後也連結到自身因專業工作活動而建立的人際網絡(熟識之動物園公關人員)，獲得動物園夜間開放活動的資訊內容，隨即前往目的地，順利取得所需素材。

回到辦公室，文字記者完成文稿撰寫，並與 B 會合剪輯新聞時，值班主管來電要求加入貓空纜車夜間營運的內容，B 意識到該則新聞產生特定素材需求的缺口；由於所需素材的內容資訊明確，隨即跑到資料片庫尋求可用之過時新聞影帶，但“截稿時間”的規範影響，讓他沒能按照原本的檢索使用程序，只能運用在組織內建構的跨部門人際網路，直接向熟識的片庫管理師尋求協助，在過時影帶片庫找到了可用的資料畫面影帶，幫助攝影記者 B 取得貓空纜車的過時新聞畫面，用來填補修改過的新聞內容「斷層」。

最後，研究者以自身的工作經驗觀察、檢視所蒐集到的次級資料，可以看到二位攝影記者，在事件現場運用「機上剪輯」(Editing on Shooting)的手法以拍攝蒐集新聞素材，是爲了因應新聞組織產製新聞的資源(記者組數、剪輯室數量)、常規(新聞線索管理、採訪任務派遣、新聞製作流程、版面規劃、截稿時間)等等限制，所形成的特定形式解題活動。此做法顯示案例中的二位攝影記者，對於新聞產製情境中，有關於組織內新聞製播的作業流程，具備充分的認知、了解作業流程中的規定

與限制；且為了能夠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新聞的產製，先將素材以特定的編排方式拍攝紀錄，以便於在新聞剪輯的過程中，能夠更為順利地挑選、編排新聞用到的畫面與聲音素材。

小 結

上述電視新聞產製的例子，在台灣電視新聞產製環境十分常見，也就是說不管是文字記者或是攝影記者，在現今的採訪情境所接觸的事件資訊，往往已經先由新聞部門的一級、二級主管篩選，甚至決定了電視新聞內容的角度，方便身兼特定新聞時段製作人的部門主管進行新聞版面的編排與設計；而部門主管與文字記者若是在採訪活動進行前能夠對特定新聞內容有更為明確的觀點設定，對攝影記者來說，等於是獲得更為明確的資訊，對於新聞事件素材的想像與獲取活動，會有很大的幫助；不過我們也從案例中看到，採訪中心主事者對新聞事件呈現的先期想像與產製過程的修改增刪，未考慮攝影記者蒐集畫面素材的專業活動，錯過蒐集事件當下影音素材的時機，致使攝影記者必須使用組織內資料庫的過時新聞影音素材作為連結敘事斷層的土石，殊為可惜，但也令攝影記者運用週遭情境的工具與資訊，發展蒐集素材活動，藉以取得特定素材以完成任務。